

阿拉伯国家的全球南方话语战略转型 与制度路径创新^{*}

丁 隆 马晓美

[内容摘要] 阿拉伯国家在全球南方话语体系中的身份与战略实践正经历由历史记忆向制度创新的转型。这一过程既延续了反殖民与去依附传统,也受地缘政治格局、资源禀赋与区域差异的多重影响,形成海湾“资源型南方”、北非“文化型南方”和黎凡特“安全型南方”三重路径。这种分化格局揭示了阿拉伯国家“南方中的北方”内在张力,反映出其在身份定位与合作路径上的多元选择。阿拉伯国家依托能源、资本与基础设施合作深化南南关系,并借助多边机制与区域制度创新融入全球治理体系,展现出参与制度塑造的积极趋向。然而,其转型仍受内部结构分化与外部干预制约。总体来看,阿拉伯国家在身份建构、战略实践与制度创新之间形成互动逻辑,其全球南方话语战略的演进既体现了南方国家重构国际秩序的共同诉求,也揭示了其在制度跃迁与话语竞争中的现实困境与动力。

[关键词] 阿拉伯国家 全球南方 身份建构 战略转型 制度创新

[作者简介] 丁隆,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马晓美,西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中图分类号]D8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15(2025)06-0053-25

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深刻变迁,全球南方话语作为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政治叙事再度崛起,成为发展中国家重构政治身份与表达治理诉求的关键平台。

^{*} 本文系202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百年变局下中东经济转型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2JJD790053)的阶段性成果。

全球南方概念不仅限于地理或文化的界定,更反映了全球经济与政治结构性变革的趋势。该话语融合对殖民遗产、文化霸权及经济不平等的深刻反思,为发展中国家争取话语权与治理自主提供了理论基础。全球南方话语延续并超越“第三世界”概念,后者最初侧重反殖反帝的集体身份,^①但在全球化加速及国际格局演变背景下,单一的“第三世界”概念已难以充分涵盖当代南方国家的多元诉求与复杂处境。^②因此,全球南方话语的理论架构部分建立在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之上,强调南方国家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结构性受限与边缘和半边缘困境。^③

对阿拉伯国家而言,全球南方话语不仅承载着反殖民历史的集体记忆,也为其争取战略自主与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再嵌入提供新的叙事框架与实践空间。尽管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多数阿拉伯国家仍处于全球经济体系的“半边缘”位置,^④既受核心国家主导,又力图突破结构性约束以实现治理自主。冷战时期,阿拉伯国家曾是反殖民运动的重要组织者,积极推动反帝反殖民议题,成为“第三世界”阵营核心。^⑤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加速与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化,阿拉伯国家的战略环境发生深刻变化,迫使其在新的全球格局中进行战略调整。在此过程中,全球南方话语为阿拉伯国家提供了重塑全球角色的创新平台与战略契机。

当前,阿拉伯国家的全球南方认同与战略实践正处于从历史记忆向制度创新转型的过程中。该转型源于反殖民与去依附传统,亦受地缘政治与资源禀赋差异的影响。在区域层面,阿拉伯国家呈现出海湾、北非与黎凡特三大区域差异化的发展路径:海湾国家因深度嵌入国际资本市场并与西方国家紧密联系,其南

① Larry Gormley, “The Arab World and the Global South: A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51, No. 2, 2019, pp. 200 ~ 220.

② Arturo Escobar, *Territories of Difference: Place, Movements, Life, Red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 ~ 27.

③ Theotonio Dos Santo, “The Structure of Depende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0, No. 2, 1970, pp. 231 ~ 236.

④ Immanuel Wallerstein, *World-Systems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30 ~ 40.

⑤ Polycarpus Panayiotopoulos, “Non-Aligned Movement and the Arab World: Political Affiniti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Vol. 14, No. 2, 2001, pp. 233 ~ 250.

方身份常受质疑;北非国家更注重区域一体化与产业自主;^①黎凡特国家则在长期安全压力下形成以安全为核心的战略取向。该分化格局揭示了阿拉伯国家在全球南方话语中的多重身份,也凸显了“南方中的北方”张力,使得其在全球治理中的身份定位更为复杂。

在战略实践层面,阿拉伯国家已超越传统的资源型合作,拓展至基础设施建设、气候治理、数字经济和国际金融等领域。通过与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的互动,阿拉伯国家在全球南方话语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并借助多边平台推动全球治理改革。^②然而,其战略转型仍面临内部差异与外部干预的双重挑战;如何在南方国家内部实现战略平衡、协调差异,仍是亟待解决的核心难题。现有研究多聚焦于阿拉伯国家的能源政治、地区安全与大国博弈,对其在全球南方话语框架下的身份转型与制度创新探讨不足,尤其缺乏对海湾、北非与黎凡特国家分化路径的系统比较。基于此,本文提出“南方中的北方”解释框架,通过比较这三大区域在战略实践中的差异,分析阿拉伯国家在全球南方话语中的多重身份及其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此框架有望为理解阿拉伯国家如何在全球南方话语体系中实现身份转型并推动制度创新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一、阿拉伯国家对全球南方话语的多维认知

在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背景下,全球南方话语逐渐成为发展中国家表达制度诉求与政治身份的战略平台,阿拉伯国家将其视为实现地缘政治独立、推动技术自主及参与全球制度重构的重要抓手。全球南方话语不仅承载了反殖民历史的集体记忆,也反映出阿拉伯国家在地缘政治利益、制度塑形意图和区域文化差异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形成的多元战略构想。阿拉伯国家对全球南方的理解并不统一,而是在话语共识与实践分化之间不断调适,构成其在国际体系中重

① Majid Khadduri, “Arab and African Regional Cooperation,”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60, No. 1, 2006, pp. 18 ~ 39.

② Ali Sayed and Ahmad Taji, “South-South Cooperation and the Arab World: A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ab Studies*, Vol. 8, No. 3, 2013, pp. 44 ~ 61.

塑身份与谋求能动性的关键支点。

阿拉伯学界对全球南方概念的兴起和演变进行了反思。埃及学者玛哈·侯斯尼指出,“第三世界”表述业已过时,“第二世界”概念随冷战结束亦不复存在。^①另一位埃及学者梅伊·萨拉赫批评“发展中国家”概念存在逻辑缺陷,认为不少国家实际上并未实现发展,而“最不发达国家”则带有蔑视意味。^②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学者将全球南方视为兼具地缘政治与文化涵义的概念,既区别于冷战时期的“三个世界”划分,又体现出当前“东升西降”的结构性趋势。同时,俄乌冲突与巴以冲突的叠加凸显全球南方的现实价值。正如阿拉伯学者侯赛因·哈里迪、海瑟姆·努里等人指出,阿拉伯国家在巴以问题、也门危机等议题上通过全球南方话语增强了话语权,尤其是在国际舆论和多边平台上对西方主导话语形成挑战。^③然而,是否实现了对西方话语的突破,仍是一个复杂问题。尽管部分阿拉伯国家在外交上采取更为主动的策略,西方特别是美国在巴以问题中的影响力依旧深远,阿拉伯国家的独立话语仍面临诸多限制。因此,在这一过程中,全球南方话语成为阿拉伯国家的重要外交杠杆——既是身份标识,更是抗衡西方话语霸权的实践工具。

通过梳理政论与学术观点,阿拉伯国家对全球南方的认知大致可分为三类:战略对冲、技术主权与制度抗争。

第一,战略对冲路径:作为对抗西方主导秩序的外交杠杆。阿拉伯国家普遍认为,全球南方话语提供了一种“去西方化”的政策通道,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外交博弈和地缘安全等议题上具有战略价值。阿尔及利亚学者穆罕默德·叶海亚

① Maha Hosny, “Ma; hiya al-Suq al-Hurra (What Is the Free Market?)”, Almarsal, March 2, 2020, <https://www.almrsal.com/post/898385>.

② Mai Salah, “Kayfa Yastafi; d al-Junu; b al-Alami min Sira’ a al-Quwa al-Kubra?” Al-Marsad (ECSS), September 18, 2023, <https://marsad.ecss.com.eg/79328/>.

③ Hussein Haridy, “The Palestinian Question at the UN,” Ahram Online, October 2, 2025, <https://english.ahram.org.eg/NewsContent/P/4/554098/Opinion/The-Palestinian-question-at-the-UN.aspx>. Haitham Nouri, “UN General Assembly Votes for Palestine,” Al-Ahram Weekly, September 17, 2025, <https://english.ahram.org.eg/NewsContent/50/1203/553186/AlAhram-Weekly/World/UN-General-Assembly-votes-for-Palestine.aspx>.

指出,全球南方话语不仅是地理概念,更是对抗西方主导秩序的政治工具。^① 海湾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尤其是沙特和阿联酋,深刻认识到南方身份所带来的话语合法性与多边合作资本,因而积极参与七十七国集团和伊斯兰合作组织(伊合组织)等多边机制,以扩大其在国际政治与全球治理中的制度影响力。例如,2023年沙特主办阿拉伯—非洲峰会,宣布向非投资 250 亿美元,旨在通过南南合作加强与亚非国家的多边联系,同时减少对欧美体系的结构性依赖,从而强化其区域战略回旋空间。

依托能源正义、技术主权和绿色转型等路径,阿拉伯国家积极推动南方议题,并强化在气候变化治理、发展融资、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话语权。尽管延续了反对西方主导结构的政治姿态,其战略实践结合自身国家利益,旨在从资源输出者转型为议题主导者。与此同时,阿拉伯国家积极加入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组织等平台,加强与其他南方国家的政治协调和经贸合作,并将此视为向多极体系拓展、对冲西方主导经济波动风险的战略制度选择。^② 这一逻辑亦体现在海湾主权财富基金投资策略调整中,反映出其通过多边参与实现制度性回旋空间的意图。阿联酋外长阿卜杜拉·本·扎耶德也曾强调,支持建立更加包容的国际秩序,推动南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③ 海湾国家支持构建多极世界,而不像以往那样认同“美国式和平”。^④ 这一表态反映出阿拉伯国家对提升国际制度参与度的明确主张。

① Mohamed Yahy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Global South Discourse: Perspectives from Arab Countries,” *Al-Mustaqbal Al-Arabi*, Vol. 42, No. 3, 2020, pp. 45 ~ 67.

② Kristian Coates Ulrichsen, “South-South Cooperation and 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Gulf States,” *Austral; Brazilian Journal of Strategy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 No. 1, 2012, pp. 103 ~ 123; Luciano Zaccara and Nesibe Hicret Battaloglu, “BRICS Membership: Gulf States’ Strategic Pivot in Shifting Global Dynamics,” *Gulf International Forum*, September 5, 2023, <https://gulfif.org/brics-membership-gulf-states-strategic-pivot-in-shifting-global-dynamics>; Nicholas Lyall and Najla Al Midfa, “Perspectives of GCC States Towards BRICS Membership: An Analysis at Macro, Meso, and Micro Levels,” *Trends Research*, July 28, 2024, <https://trendsresearch.org/insight/perspectives-of-gcc-states-towards-brics-membership-an-analysis-at-macro-meso-and-micro-levels>.

③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to the United Nations, “UAE Statement at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Meeting on a New Orientation for Reformed Multilateralism,” December 14, 2022, <https://uaeun.org/statement/uae-unsco-multilateralism-14dec>.

④ Mohammed Khalfan Sawafi, “Why the Gulf Arab States Root for a Multipolar World Order?” *Future*, May 19, 2022, <https://futureuae.com/en-US/Mainpage/Item/7300/why-the-gulf-arab-states-root-for-a-multipolar-world-order>.

第二,技术主权路径:提升自主创新与技术共享的战略诉求。北非和海湾国家普遍重视通过全球南方合作实现技术独立与自主创新。阿尔及利亚总统阿卜杜勒·马吉德·特本呼吁南方国家应共享技术,而非仅作为北方技术的消费者。阿尔及利亚与中国合作建立磷酸盐全产业链被视为“南南技术共建”的典范,标志合作模式从资源交换向制度共建转型。约旦学者拉尼娅·马沙尔提出建立“全球南方绿色技术共享平台”,整合中国技术、海湾资金和北非应用场景,形成三位一体的南方合作机制,打造技术协同与知识赋能体系。为推动绿色技术的南南合作,一些政策研究与区域倡议建议以“中国技术供给—海湾与阿拉伯资本—北非应用场景”的方式实现要素互补:中国在绿色技术与产业链上具备对外转移与投资能力;海湾国家的主权资本与清洁能源转型目标提供融资与市场牵引;同时,摩洛哥等北非国家在绿氢与可再生能源项目中展现出可推广的应用场景与制度创新空间。^① 该路径还可借助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等多边平台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机构,实现规则与能力的平台化对接。该战略不仅旨在实现技术主权,还通过技术合作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科技创新中的边缘化地位。

第三,制度抗争路径:推动制度话语的自主构建与全球治理改革。在全球南方框架下,阿拉伯国家不仅关注物质利益和技术共享,还致力于主动构建制度性话语。阿尔及利亚学者穆罕默德·叶海亚强调“去附庸化”与“非依附性合作”的理论意义,主张南方国家通过制度平等与合作对接建立新型关系,摆脱对西方技术、资本与制度模式的路径依赖,进而构建“南方规范共同体”。^② 黎巴嫩学者吉尔伯特·阿卡指出,尽管全球南方话语在某些场合被广泛使用,它仍远未成为实体化的共同体,甚至可能陷入不均等结构,^③因此呼吁警惕“修辞化的南方认同”。

① Zhang Chuanhong and Lin Haisen, “China’s Climate and Energy Partnerships in the Global South,” SAIIA, July, 2024, https://saiaa.org.za/wp-content/uploads/2024/07/SAIIA_PB_297_ChinaClimateEnergy.pdf; “Morocco Taps Chinese Firms for Major Green Hydrogen Project,” CGTN, March 11, 2025, <https://news.cgtn.com/news/2025-03-11/Morocco-taps-Chinese-firms-for-major-green-hydrogen-project-1BE8rDr0cqQ/p.html>; Faris Al-Sulayman and Jon B. Alterman, “China’s Essential Role in the Gulf States’ Energy Transitions,” CSIS Brief, December 11, 2023, <https://www.csis.org/analysis/chinas-essential-role-gulf-states-energy-transitions>.

② Mohamed Yahia, “The Global South and Arab Aspirations,” *Arab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2, No. 1, 2018, pp. 45 ~ 67.

③ Gilbert Achcar, “The Myth of the Global South,” *Journal of Global Studies*, Vol. 12, No. 3, 2024, pp. 123 ~ 139.

埃及学者纳比勒·阿卜杜勒·法塔赫则认为,全球南方应成为反对西方主导的治理体系的制度实验场,而非外交辞令。^①阿拉伯国家应通过制度创新实现规则共建和标准共享,以突破“中心—边缘”结构。

这三类认知相互交织、形成互动。在战略对冲逻辑驱动下,阿拉伯国家倾向于将技术主权与制度改革视为互补路径:通过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以削弱对西方技术的依附,同时在多边框架中推进规则重构与制度再嵌入。以海湾国家为例,在推动绿色转型过程中,除了在资源合作上加强与其他南方国家的联系外,还利用自身技术创新与资本优势,提升在全球南方框架中的制度性参与。这不仅是对西方主导秩序的战略回应,也是其实现自主发展的重要路径。总体来看,阿拉伯国家的全球南方认知与实践是在多维度、多路径的综合考量下展开的,各路径间相互作用进一步增强了其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与能动性。不同区域国家在地缘环境、经济结构与政治取向上的分化,使其对全球南方的理解和运用路径各具侧重:海湾国家以“战略对冲”与制度性参与为核心,力求在多极化格局中扩大制度影响力;北非国家则更注重通过技术合作与产业升级实现自主发展;而黎凡特地区将全球南方视为获取国际支持与战略缓冲的关键工具。尽管这些差异表明阿拉伯在全球南方话语中的多重身份,但在反殖民历史记忆、发展自主诉求以及寻求制度参与的共同目标下,阿拉伯国家仍表现出趋同趋势。这种差异性与趋同性的互动,不仅助力其重塑国际身份,也为未来在全球治理结构中争取更大话语权奠定基础。

二、阿拉伯国家全球南方身份建构的内生逻辑

阿拉伯政界与学界在形成多元化的全球南方话语认知与战略定位后,如何在现实政治中将这一话语转化为政治身份与制度路径,成为观察其全球战略转型的核心视角。随着全球南方话语逐渐超越地理范畴,成为涵盖文化、政治与经

^① Nasser Abdel Fattah, “Reforming Global Governance: The Role of the Global South,” *Middle East Policy Journal*, Vol. 31, No. 1, 2025, pp. 78 ~ 92.

济的复合符号体系,它在挑战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①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集体行动平台。全球南方不再只是被动受体,而是在多边舞台上以正义与主权为核心重塑叙事。^②阿拉伯国家凭借独特的历史记忆与地缘优势,逐步成为该体系中的活跃力量,以制度性参与回应殖民遗产造成的结构性不平等,并在全球治理体系重塑过程中寻求话语能动性。

然而,这一身份建构并非线性或静态,而是在反殖民记忆、宗教文化与国际政治互动中动态形成,尤其在海湾与北非国家的实践中,可观察到“南方内部的南北差异”与“南方中的北方”张力。^③这既揭示了阿拉伯国家在身份建构上的复杂性,也凸显了其在南方框架下推动区域整合与战略自主的必要性。

(一) 反殖民遗产与全球南方认同的历史根基

全球南方话语起源于 20 世纪中叶的反殖民运动,是发展中国家集体抵抗西方霸权的政治表达。^④阿拉伯国家作为反殖民运动的重要力量,通过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与伊合组织等机制,将这种反抗精神制度化,^⑤形成带有鲜明政治与文化印记的南方认同。阿尔及利亚、埃及等国不仅在反殖民斗争中塑造了全球南方的象征性地位,也在文化与历史记忆中凝聚了跨国共同体意识。全球南方话语既是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反抗,也是阿拉伯国家追求政治自主与经济平等的思想表达。^⑥这一话语为阿拉伯国家提供了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区域性身份框架,强化了集体记忆的政治转化功能。^⑦

① Sharad Chari and Katherine Verdery, "Thinking Between the Posts: Postcolonialism, Postsocialism, and Ethnography after the Cold War,"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51, No. 1, 2009, pp. 6 ~ 34.

② Ahmed Kandil, "October 2025, Caracas: When History Whispered and Global South Finally Spoke," *Ahram Online*, October 14, 2025, <https://english.ahram.org.eg/NewsContentP/4/554849/Opinion/October-%2C-Caracas-When-history-whispered-and-Globa.aspx>.

③ Matthew Weldon, "'Northern' Elites and 'Southern' Populations: South-South Cooperation and the 'South' in the Gulf,"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40, No. 1, 2019, pp. 161 ~ 177.

④ Arturo Escobar, *Encountering Development: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21 ~ 54.

⑤ Salah El-Din Hafiz, "Arab Identity and Global South Solidarity,"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51, No. 3, pp. 287 ~ 306.

⑥ Mohamed Yahia, "The Global South and Arab Aspirations," *Arab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2, No. 1, 2018, pp. 45 ~ 67.

⑦ Salah El-Din Hafiz, "Arab Identity and Global South Solidarity,"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51, No. 3, 2015, pp. 287 ~ 306.

在实践层面,阿拉伯国家通过经济多元化、技术自主与区域合作,不断将反殖民精神转化为现实的政策动力。^①例如,阿尔及利亚实施“国家工业复兴计划”以减少对欧洲市场依赖;埃及借助苏伊士运河经济区与非洲伙伴共建产业合作网络探索产业自主发展;海湾国家在推动能源转型与绿色金融中强化“南方正义”议题以提升气候治理话语合法性。这些政策体现出阿拉伯国家将反殖民经验转化为制度创新与战略实践的努力,进而使反殖民遗产成为当代制度资源。

(二) 地缘政治差异与全球南方认同的多元建构

阿拉伯世界的全球南方认同并非单一,而是在地缘政治、经济利益与文化认同交织中演化。尽管共享反殖民遗产,不同区域国家在身份建构上呈现出差异。

第一,海湾国家的“资源型南方”身份。沙特、阿联酋等国凭借丰富的油气资源和雄厚的资本实力,在全球政治格局中形成独特的“南方中的北方”地位:既与全球南方共享被殖民与依附发展的历史记忆,又因与西方在安全、金融和技术领域的紧密联系而具备某种“北方性”。这种双重角色使其既能以南方国家身份参与反殖民、发展合作等议题,又因对美欧安全保障与高科技体系的依赖而在道义上面临一定的合法性张力。^②

海湾国家的身份模糊性促使其寻求新的战略叙事。近年来,它们试图通过能源转型与气候议题来重塑国际形象,从传统的油气出口国转向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积极行动者。阿联酋主办联合国气候大会并牵头提出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气候治理目标;沙特推出“绿色中东倡议”,旨在通过区域合作推动清洁能源与碳捕捉技术的发展。这些举措不仅体现了海湾国家对全球气候治理的积极响应,也代表着其在全球南方框架下的叙事再造——通过承担环境责任来强化其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

海湾国家的这一转向揭示了“资源型南方”的内在变革:它们不再只是被动依附于全球资本与能源市场的边缘角色,而是通过技术投资与外交多元化积极

^① Adom Getachew, *Worldmaking after Empire: The Rise and Fall of Self-Determin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142 ~ 175.

^② Matthew Weldon, “‘Northern’ Elites and ‘Southern’ Populations: South-South Cooperation and the ‘South’ in the Gulf,”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40, No. 1, 2019, pp. 161 ~ 177.

介入全球治理议程。这种身份的重塑既反映出南方国家内部的分层,也体现了全球南北关系的新流动性。海湾国家正努力在依赖与自主、资源与转型之间取得平衡,试图以能源治理的新实践重构其在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地位。

第二,北非国家的“文化型南方”身份。埃及、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等国家因其殖民历史和多元文化背景,在全球南方的身份建构中具有特殊性。这些国家在法国殖民统治下经历了深刻的文化变革,法语和阿马齐格语等语言的广泛使用,以及基于法国殖民经验的现代性构建,促成其在阿拉伯世界之外的文化认同。因此,北非国家的“文化型南方”身份并非单纯地被殖民经历所塑造,而是通过文化自觉与独立性的追求,形成一种带有跨文化特征的身份表达。

埃及学者塔哈·侯赛因曾强调埃及作为“尼罗河文明体”的文化独立性,揭示北非国家对其历史与文化遗产的独特认知。^①这不仅突破了传统的阿拉伯世界观,强化埃及在非洲与阿拉伯文化之间的双重身份,也为北非国家在全球南方话语中的定位提供了新的视角。北非的文化自觉使这些国家在全球南方框架下,能够提出不同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文化议题,构建起自身的文化政治叙事。

在区域合作和经济自主的追求中,北非国家逐步加强其在南方事务中的领导地位。例如,阿尔及利亚与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合作,不仅是能源领域的技术交流,也是北非国家在全球南方资源与发展领域的战略布局。此外,埃及在非洲联盟框架下推动非洲一体化,进一步强化其作为文化与政治纽带的地位。这种合作不仅展现了北非国家通过经济合作与区域一体化提升其国际地位的策略,也表明其在南方话语中的自主性与独立性。

第三,黎凡特国家的“安全型南方”身份。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和约旦等国长期处于冲突和大国博弈的交汇点,形成以安全与主权维护为核心的“安全型南方”身份。这些国家的外交策略不仅依赖于道义资源,还通过具体的安全诉求和抵抗立场,推动其在全球南方的影响力。巴勒斯坦问题是其争取国际支持与凝聚南方国家团结的核心道义资源。通过联合国等多边平台,巴勒斯坦提出

^① Taha Hussein, *Mustaqbal al-Thaqafa fi Misr (The Future of Culture in Egypt)*, Cairo: Al-Ma'arif Press, 1944, pp. 13 ~ 22.

的民族自决和反占领诉求,增强了黎凡特国家在南方框架中的政治话语权,也使其获得了在全球争议中的道义支持。

叙利亚借助与俄罗斯和伊朗的战略联盟,将安全诉求转化为反霸权的外交策略。在面对内外压力时,叙利亚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强调国家主权与反干预的立场,推动安全正义议题的国际化。黎巴嫩通过其反霸权外交立场,特别是通过真主党等抵抗组织,强化其在全球南方安全话语中的地位;在联合国等场合积极推动反对以色列军事侵略的议题,争取国际对其国家主权的支持。约旦则通过强调将发展与安全议题结合,推动全球南方在安全治理中的多元化。面对大量叙利亚难民的涌入,约旦在推动国际社会关注难民保护和区域稳定的同时,也加强了在全球安全框架中的话语权。

尽管黎凡特国家在资源和产业整合能力上处于劣势,但其将长期的安全困境转化为话语政治,维系在全球南方安全议题中的重要地位。这些国家通过强调安全与主权的不可分割性,在多边框架内推动安全正义和人道安全议题的制度化,有效拓展了南方话语的内涵和影响力。

总体而言,海湾、北非与黎凡特三类国家的差异不仅反映了阿拉伯世界在历史遗产、地缘格局与战略选择上的分化,也揭示出其在全球南方框架下重塑身份的复杂性与张力。阿拉伯国家在应对西方压力与内部结构性不平等时,面临从资源依附、文化多样到安全脆弱等多重挑战。如何在反殖民记忆与现实政治间协调立场,平衡发展、文化与安全三重诉求,或将成为其在全球南方体系中寻求主体性与制度影响力的关键命题。

(三) 制度杠杆与全球南方话语的战略运用

随着全球南方话语在国际体系中的深化与演变,阿拉伯国家正逐步从反殖民时代的象征性政治认同转向在全球治理中寻求制度化参与。这一转向是一种持续的结构性的调整,既体现了对国际不平等体系的批判,也反映出阿拉伯国家在多边外交实践中不断积累的话语经验与制度动能。全球南方话语正在成为阿拉伯国家追求国家利益、区域自主与制度改革的重要工具。

第一,多边平台的制度化发声。阿拉伯国家通过联合国大会、中国—阿拉伯

国家合作论坛、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等机制,将发展融资不均、环境治理不公和巴勒斯坦地位等议题纳入南方国家的共同议程。这种制度化发声提升了相关议题的国际可见度,也增强了南方国家的集体认同与谈判合力,推动南方话语从“抵抗语言”向“治理语言”的过渡。这一变化说明阿拉伯国家在全球治理议题中正从边缘性参与者向制度性发声者转变。

第二,跨区域联盟的战略协同。依托七十七国集团、不结盟运动及非洲联盟等南南合作机制,阿拉伯国家在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与金融公平等议题上积极倡导“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埃及与阿尔及利亚推动非洲绿色融资机制的建立,体现出阿拉伯国家在将南方话语转化为可操作政策工具方面的努力。这种跨区域协同不仅强化了南方国家的制度话语地位,也为阿拉伯国家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积累了制度参与的实践经验。

第三,话语转译与政策灵活性。阿拉伯国家在不同场合灵活运用南方话语,既保留反殖民历史与道义根基,又将其转译为谈判立场与政策主张。这种从“抵抗话语”到“治理话语”的转化,使阿拉伯国家能够在气候治理、数字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等新兴领域中拓展话语空间。它们不再只是南方叙事的被动承载者,而是在多边机制中积极塑造议程与规则的潜在行动者。

阿拉伯国家在全球南方话语的战略运用上,尚处于从政治象征向制度实践转化的进程中。这一转化仍面临结构性约束,但已显现出通过多边平台、区域联盟和话语转译来提升国际能动性的趋势。这种渐进式的实践表明,全球南方话语正成为阿拉伯国家在重塑全球治理格局中争取制度话语权的重要途径。

三、阿拉伯国家的全球南方战略实践与制度布局转型

在全球治理体系加速重构、南北关系持续分化的背景下,全球南方逐渐演化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制度自主与话语重塑的战略平台。阿拉伯国家在这一进程中的角色日益凸显。作为连接亚非的地缘枢纽与能源重地,它们正努力突破传统资源输出型国家的单一定位,在多边机制、绿色能源与制度创新等领域探索“由

资源向制度”的战略转型。这一过程并非线性展开,而是在资源依赖与制度赋权、地缘分化与区域整合、国家利益与南方共识的张力中动态推进。阿拉伯国家的制度参与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与区域差异;在多边外交平台上,通过议题设定与规则塑造,增强在全球南方机制中的制度存在感;在能源、基础设施与农业合作方面,以资本输出和技术协作为杠杆,构建跨区域经济网络;在制度创新与技术治理层面,阿尔及利亚等北非国家提出以“非依附性”为核心的合作模式,实现从制度接受者向制度探索者的转变。

然而,这种制度化实践仍处于形成阶段,并面临现实与结构的多重约束。阿拉伯国家虽在南南合作与全球治理议题中展现出积极能动性,但其制度建构能力仍受到外部结构性不平衡、内部经济结构差异以及政策连续性不足的制约。在具体实践中,阿拉伯国家通过多层次的策略性协商与机制性参与,逐步积累制度话语权,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南方性”政治与经济议题的制度化表达。

总体来看,阿拉伯国家的全球南方战略不应仅被理解为外交姿态或经济扩展,更是一种制度意义上的角色重塑。其战略实践既回应了南方国家的发展诉求,也体现出在多极化格局下对全球治理结构的再嵌入与再定义。尽管尚未摆脱边缘化结构的约束,但其增量式推进已扩展南方国家的制度能动性与议题参与度。

(一) 多边平台中的议题设定与制度话语重构

在全球治理结构去中心化与权力多元化背景下,阿拉伯国家将联合国大会、七十七国集团、阿拉伯国家联盟以及“金砖+”等多边机制视为重塑国际角色与提升制度能见度的重要场域。这些机制不仅为其与非洲、南亚、拉美等区域国家构建战略性政治联结提供了契机,也为其推动南南合作走向制度化打造了战略空间。相较于传统的受援者定位,他们更频繁参与规则磋商,将自身关注的能源正义、发展融资、气候公正与粮食安全等议题,转译为可在南方国家范围内形成

共鸣的制度化主张。基于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文本的长期语料,^①可以观察到阿拉伯国家围绕“发展”“气候”“金融”的关键词在新近阶段呈现更高频率和更强的跨区域呼应度,显示其在全球议程中的制度活跃度有所增强。

在实践路径上,阿拉伯国家普遍采取议题同构策略,将自身发展议程制度化为全球南方的集体诉求。以气候治理为例,阿拉伯国家在国际气候治理框架下将南方融资可及性作为关键议题推进。阿联酋主办的第 28 届联合国气候大会成为阿拉伯国家在全球南方机制中制度化发声的重要节点,会上设立的阿尔特拉气候投融资平台初始资本达 300 亿美元,^②旨在支持非洲和西亚地区的可再生能源与减排项目。该平台的推出体现出阿拉伯国家通过制度工具化路径参与全球绿色治理的努力,使其在“绿色治理—融资架构—市场动员”链条上形成制度抓手。同时,此次气候大会在损失与损害基金的运营机制达成协议并正式启动,^③为脆弱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资金通道。这一结果虽非阿拉伯国家单方推动,但其在七十七国集团框架与阿盟内部协同中所形成的议题合力,有助于将气候不平等纳入制度文本之中,提升南方国家在资金与规则谈判中的筹码。阿拉伯国家不仅强调绿色转型的多路径合法性,还积极争取发展中国家在能源结构选择上的自主权,以抵抗西方治理模式的规范化压力。

在更广泛的南南平台上,2023 年七十七国集团峰会通过的《哈瓦那宣言》明确突出科学、技术与创新对发展中世界的战略意义,强调改革全球治理安排以更好反映南方诉求。^④ 这一宣言为阿拉伯国家与更广泛南方阵营提供了制度化共

① Jankin, Slava, Alexander Baturo and Niheer Dasandi, “United Nations General Debate Corpus 1946—2024,” Harvard Dataverse, November 24, 2024, <https://dataverse.harvard.edu/dataset.xhtml?persistentId=doi:10.7910/DVN/OTJX8Y>.

② ALTERRA, “UAE Commits US \$30 Billion in Catalytic Capital to Launch Landmark Climate-focused Investment Vehicle at COP28,” December 1, 2023, <https://www.alterra.ae/news/uae-commits-us-30-billion-in-catalytic-capital-to-launch-landmark-climate-focused-investment-vehicle-at-cop28>.

③ UNFCCC, “Operationalization of the New Funding Arrangements, Including a Fund, for Responding to Loss and Damage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s 2 ~ 3 of Decisions 2/CP.27 and 2/CMA.4,” December 13, 2023, https://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cop28_auv_8g_lnd.pdf.

④ UNOSSC, “Havana Declaration on Current Development Challenges: The Rol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September 22, 2023, <https://unsouthsouth.org/wp-content/uploads/2023/09/HAVANA-DECLARATION-2023.pdf>.

同语言。此外,阿拉伯国家在多边平台中逐步形成了“资源—治理—制度”的联结型话语逻辑。能源与资源作为战略资本,不再仅仅是经济收益的来源,而是被重构为能源正义、发展权公平与技术可及性等议题,转化为制度性话语资本。^①这种转化使阿拉伯国家得以将传统的物质优势延伸为制度参与的基础,提升其在南南机制中的议题设定与规则塑造能力。通过在南南框架下构建跨区域议题联盟,如能源安全与气候融资、粮食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联合倡议,阿拉伯国家推动形成了南方国家之间的制度联结网络。这一趋势表明,它们正从单纯的合作参与者,逐步向制度塑造者与规范建构者转型,尽管这一过程仍受到国际制度权力不平衡的制约。

总体而言,阿拉伯国家在多边机制中的实践展现了从参与协作向议题塑造的逐步转型。在这一过程中,阿拉伯国家通过将资源、安全等传统议题转化为能源正义、融资公平和技术能力建设等规范性议题,增强了南方机制内的集体协同性;同时,借助具体的资金工具和制度文本,如阿尔特拉气候基金、损失与损害基金运行安排以及《哈瓦那宣言》等,将抵抗性话语转化为具有政策约束力的治理语言和可操作的制度工具。这一转型标志着阿拉伯国家在全球南方机制中,从合作参与者逐步迈向制度塑造者与规范建构者。然而,尽管阿拉伯国家在推动议题制度化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其制度能动性仍受限于全球金融与知识治理体系的既有结构。这种转化过程表现为增量式的嵌入,而非革命性的范式突破,后续成效仍取决于资金的实际到位、项目落地的质量及跨区域规则协同的可持续性。因此,阿拉伯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战略布局仍处于发展中,其在全球南方话语体系中的角色变革虽初具成效,但仍面临结构性边缘化的挑战。

(二) 能源资本与基础设施合作的南方经济网络构建

随着全球南方国家间经济互动日趋紧密、制度化网络不断扩展,阿拉伯国家正以能源资本、主权基金与基础设施投资为核心杠杆,构筑跨区域南方经济网络,推动资源禀赋向制度影响力的转化。

^① Mahmoud Abdel El-Sayed, “The Role of Arab Countries in Energy Security: An Analysi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Politics*, Vol. 45, No. 2, 2010, pp. 34 ~ 56.

第一,能源资本的制度转化与正当性建构。海湾国家在能源领域的制度实践显示出明显的多元化趋势。它们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化石能源出口,而是通过绿色能源投资、技术合作与标准制定等方式,尝试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中获得制度性话语空间。自 2015 年以来,阿联酋和沙特在非洲能源项目上的投资总额增长逾两倍,^①覆盖光伏、风能与氢能等关键领域。例如,阿联酋马斯达尔公司与肯尼亚国家电网合作的风电项目装机容量约 310 兆瓦,年发电量占肯尼亚电力供应结构的 15% 左右。^② 这类项目虽以经济互利为导向,但在实践中已形成以制度协定、绿色融资和标准输出为核心的合作框架,使能源资本转化为可持续的制度性资源。海湾国家借助绿色投资协定、联合研发机制与能源标准化倡议,逐步形成兼具经济回报与治理正当性的制度路径,部分削弱了传统西方能源秩序的单边垄断。^③

第二,粮食外交与资源互补型制度联结。面对水资源匮乏与耕地有限的结构性瓶颈,阿拉伯国家日益将粮食外交作为增强制度性影响力的战略抓手。沙特、阿联酋等国通过主权基金在非洲投资农业项目,旨在保障国内粮食安全,推动以资源互补和制度共建为核心的南南合作模式。^④ 例如,沙特在苏丹与埃塞俄比亚建立农业经济特区,通过技术援助、灌溉体系建设与农产品回购机制实现双向嵌入。这类合作既回应了非洲伙伴的本地发展诉求,又在制度层面确立了稳定的规则体系。粮食外交因此超越了单向资源配置,演变为制度化的合作框架,有助于构建南方国家间更具韧性的经济安全纽带。

第三,基础设施投资与跨区域制度网络。在南南合作的制度化演进中,基础设施投资逐渐成为阿拉伯国家塑造制度性影响力的重要支点。港口、铁路与能源枢纽等硬件建设项目被重新定义为制度嵌入与网络治理的接口。以阿联酋的

①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African Economic Outlook 2023: Mobilizing Private Sector Finance for Climate and Green Growth," May 24, 2023, <https://www.afdb.org/en/documents/african-economic-outlook-2023>.

② Mohammed Zayed, "UAE's Energy Investment in Africa: Strategic Implications," *African Development Review*, Vol. 31, No. 3, 2019, pp. 392 ~ 407.

③ Fatima Al-Mazrouei, "Energy Diplomacy and Global South: The Role of Gulf Countries in Africa's Energy Secto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50, No. 2, 2018, pp. 225 ~ 241.

④ Khalid Al-Rashed, "Food Security and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in the Arab World," *Arab Economic Journal*, Vol. 23, No. 4, 2020, pp. 147 ~ 162.

迪拜世界港口公司为例,其在吉布提、索马里、坦桑尼亚、斯里兰卡与巴基斯坦等地投资和运营 20 余个港口项目,构建了贯通红海—印度洋—东非沿岸的战略走廊。^① 这些项目广泛采用公私合营机制、跨境税收协调与国际仲裁条款,使港口从物流节点转化为制度输出平台。通过“硬件投资 + 制度嵌入”,阿拉伯国家正构建一个跨区域的治理网络,增强其在南方经济体系中的制度枢纽功能。

总体而言,能源、粮食与基础设施构成阿拉伯国家在南方经济网络中积累制度性影响力的三重支点。通过绿色能源投资、跨境农业合作与基础设施布局,它们正推动从资源依附向制度嵌入的渐进式转化。这一过程虽仍受制于外部金融结构与知识治理体系,但已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南南合作的制度化进程,提升了阿拉伯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可见度与议题参与度。阿拉伯国家的实践表明,经济资本正逐步演化为制度资本,而“资源—治理—制度”的互动逻辑正在成为理解其南方战略的重要分析框架。

(三) 技术转移与制度创新的议程主张

随着全球南方议程逐步由地缘认同转向制度竞争,阿尔及利亚等北非国家正在推动不同于传统资源导向型合作的“制度型南南合作”模式。该模式以技术转移、能力建设与制度协同为核心,旨在打破南北合作中长期存在的技术依赖与制度不对称,推动南方国家在治理上实现自主与平权。

第一,合作原则与非依附路径。在合作原则层面,阿尔及利亚所倡导的非依附性合作强调制度平权与技术自主并重,旨在打破南北合作中长期存在的结构性依赖格局,体现出“文化型南方”对自主发展和制度平等的追求。其《国家数字化转型战略》明确提出“维护数字主权”“以本地制度能力为治理核心”的原则,^② 体现出在南南合作中追求自主制度塑造的政策取向。该战略将技术合作与制度建设并置,意在通过强化本地治理能力与知识体系,提升在区域制度网络中的能动地位。阿尔及利亚通过强化数字化治理与行政透明体系,将制度自主从治理

^① Mohamed Hassan, “Port Development and Trade Cooperation: The UAE’s Role in Global South Integration,” *Journal of Global Logistics and Trade*, Vol. 10, No. 1, 2018, pp. 50 ~ 65.

^② Farida Chikhi, “Reforming Global Governance: Algeria’s Contribution to More Equitable South-South Cooperation,” *Global Governance Review*, Vol. 29, No. 2, 2020, pp. 135 ~ 150.

理念转化为可持续的治理能力。国内的数字转型战略与反腐机制建设,^①为其在南南合作中坚持非依附性原则提供了制度基础和现实支撑。

与此同时,阿尔及利亚将非依附性原则融入与非洲邻国的合作实践中。例如,与毛里塔尼亚联合开发的跨境基础设施与自由贸易区项目,强化了区域经济互联互通;与南非在科学、技术与创新领域签署的合作协议,则以知识共享与制度共建为核心,推动非洲国家在技术治理议题上的制度协作。^② 这些合作并未延续传统援助逻辑,^③而是以规则共建与能力互为导向,展现了南南合作从资源交换向制度共建的结构性转向。总体来看,阿尔及利亚的非依附性合作实践构成南南合作的一种制度创新样态。通过数字主权战略、制度化治理与跨区域规则协作,在制度平权层面实现了部分制度嵌入。这一进程虽仍受制于经济结构与外部金融依赖,但已体现出发展中国家在制度塑造领域通过渐进式制度能动性拓展合作空间的可能性。

第二,合作模式与制度赋能转型。在合作模式层面,阿尔及利亚正通过将技术输出与制度协同相结合,推动从资源互换型合作向制度赋能型合作的转变。这一模式以能力建设和制度设计为核心,旨在通过技术与规则的协同输出,弱化南方国家对外部体系的结构性依赖,形成可持续的治理基础。在能源与基础设施合作中,阿尔及利亚与尼日尔的协作体现出这种制度赋能逻辑。双方在炼化、能源运输与投资监管等领域建立了长期合作机制,阿尔及利亚不仅提供技术与设备,还参与项目管理、培训和合规框架的设计,从而使合作成果能够在制度层

① Laib Rima and Laib Samia, "The Strategy of the High Authority for Transparency and Anti-Corruption in Promoting Transparency and Ethical Governance in Algeria," *Journal of Legal, Social and Scientific Studies*, Vol. 13, No. 2, pp. 1 ~ 28.

② Lamine Chikhi, "Algeria and Mauritania Open Border Gate to Boost Trade," Reuters, February 22, 2024,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frica/algeria-mauritania-open-border-gate-boost-trade-2024-02-22/>;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strengthens cooperation with Algeria," July 18, 2025, <https://www.gov.za/news/media-statements/science-technology-and-innovation-strengthens-cooperation-algeria-18-jul-2025>.

③ Farida Chikhi, "Reforming Global Governance: Algeria's Contribution to More Equitable South-South Cooperation," *Global Governance Review*, Vol. 29, No. 2, 2020, pp. 135 ~ 150.

面得到延续。^①类似地,在跨撒哈拉天然气管道项目中,阿尔及利亚与尼日尔、尼日利亚共同推动能源走廊建设,并在规划标准、投资协定与跨国协调机制中承担关键角色。^②这表明其合作重心正从单向技术援助转向共同治理与规则共建。

这类合作虽然仍以能源与基础设施为主要载体,但其深层逻辑已超越传统的经济互补模式。阿尔及利亚通过制度性参与,强化了合作伙伴在项目治理、技术转移与政策执行中的主体性,从而将合作转化为能力共建的过程。这种以制度为支撑的技术合作,不仅提高了南方国家在治理体系中的协同性,也为其探索制度自主提供了实践路径。总体而言,阿尔及利亚的合作模式体现出南南合作的制度化转向:以共同制定规则、共享治理经验与联合建设机制为核心,通过“制度—促转型”的路径实现合作的可持续性。这种转型虽仍受制于资本结构与制度承接能力的限制,但已显示出南方国家在制度创新与能力建设层面日益增强的主体能动性。

第三,绿色治理中的机制化资本介入。在绿色治理领域,阿联酋等海湾国家正通过阿尔特拉气候投融资平台推动资本介入,旨在实现从宣言性承诺向制度化资本介入的转变。阿联酋承诺出资 300 亿美元作为催化资本,以改善全球南方国家气候治理的融资可得性,并与国际资产管理机构合作启动子基金,以撬动更大规模的私人资本流入。^③该平台不仅作为融资工具,更担负起制度载体的职能,推动将气候治理的承诺提升为实际可操作的资本路径,增强在南方国家中的制度能见度。通过这种机制,海湾国家的资本介入已不再局限于资源投入,而是转向更深层次的治理资本输出,标志着它们在全球绿色治理中的角色转型。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阿尔特拉平台的启动为南方国家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融资渠道,且其背后的资本与资源配置在推动绿色治理方面展现出潜力,但这一机制仍处

① Algeria Invest, “Algeria, Niger: A Petrochemical Complex and Refinery at Dosso to Consolidate Energy Cooperation,” February 12, 2025, <https://algeriainvest.com/premium-news/algerie-niger-un-complexe-petrochimique-et-une-raffinerie-a-dosso-pour-consolider-la-cooperation-energetique>.

② “Algeria, Niger Discuss Trans-Saharan Gas Pipeline Project,” Xinhua News, September 30, 2024, <https://english.news.cn/africa/20240930/5167c17a7926409ab2071af01e24690b/c.html>.

③ Luis Garcia, “Altéra’s Plan to Unlock Climate Investments Targets Developing World,” WSJ, October 14, 2025, <https://www.wsj.com/articles/alteras-plan-to-unlock-climate-investments-targets-developing-world-9ad74aba>.

于早期运营阶段,其实际项目的落地效果、资本撬动倍数以及跨区域的制度协同效应仍需进一步的时间与实践来验证。因此,尽管这一平台为未来的绿色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工具,它的长期效应仍需从实际操作中进行观察与评估。

海湾国家也在技术主权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在金融科技、数据治理与绿色金融领域。沙特与阿联酋等国提出建立本地化伦理与监管框架的倡议,主张发展中国家应拥有自主的技术治理权。这些国家在海合会框架下加速数据法制建设与人工智能治理的区域协作,并在数据隐私、数字政府与跨境数据流动等领域出台新法规或推动联合倡议。^① 海湾国家通过这些举措,试图将技术与治理规则的制定纳入自身主导或参与的机制中,进而在新兴制度赛道中争取更多话语权。这些进展表明,海湾国家不仅在绿色资本的投入上取得突破,也在推动全球数字治理规则的重构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总体而言,阿拉伯国家的“制度型南南合作”实践正推动全球治理格局的转型。通过倡导制度平权、推动技术共享与能力对接,它们在加强南方国家间制度互信的同时,也为全球治理体系注入了更多的制度多样性与规范竞争力。阿拉伯国家正致力于从资源输出者到制度塑造者的战略跃迁;海湾国家通过资本输出与制度嵌入构建跨区域合作网络,北非国家如阿尔及利亚则以非依附性合作为核心,探索以技术主权和制度协同为导向的合作路径。尽管面临内部战略分化与外部结构性约束,这一转型已使阿拉伯国家在全球南方合作机制中初步确立制度性身份,并推动“南方性”从资源依赖向规则制定的转变。这种转型不仅重塑了阿拉伯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议题主导权与规范输出力,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制度路径。尽管这一进程仍处于增量式推进阶段,阿拉伯国家通过加强规则塑造与能力建设,正在为全球治理的多极化进程作出重要贡献,展现出日益增强的制度能动性与全球治理的参与深度。

^① Hajar El Haddaoui, “Digital Plans in GCC Shift from Talk to Action in New Pact,” Gulf News, September 17, 2025, <https://gulfnews.com/business/analysis/digital-plans-in-gcc-shift-from-talk-to-action-in-new-pact-1.500271779>; Sara Bazoobandi, “The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GCC) Countries’ Quest for Economic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GIGA, No. 1, 2025, https://pure.giga-hamburg.de/ws/files/52497132/DigiTraL_01_2025_Bazoobandi.pdf.

四、阿拉伯国家在全球南方话语建构中的制度跃迁

在全球政治结构加速重构的背景下,阿拉伯国家正经历从边缘化接受者向规范性塑造者的战略转型。这一转型既体现在其对多边机制的制度性介入与治理能力建设,也反映在其能动性 with 规范性话语权的提升。阿拉伯国家逐步摆脱单一的资源依赖角色,转向通过制度嵌入、发展权话语主导和治理理念倡议,以重构政治身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具代表性与公平性的方向演进。尽管面临区域内部差异、合作机制碎片化及外部力量干预等挑战,这一转型仍显示出阿拉伯国家在全球南方话语体系中的制度塑造潜力。这一制度性跃迁既是对现行国际秩序的批判性回应,也是其在全球南方集体身份中实现结构性再定位的重要体现。

(一) 多边机制中的“中介型国家”构建

随着全球治理体系由单极向多极演变,阿拉伯国家意识到,单纯依赖能源输出和财政援助已难以维护战略自主性与话语地位。在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主导全球南方议程的背景下,阿拉伯国家亟需通过制度嵌入与议题塑造来实现身份转型,逐步确立“中介型国家”的战略定位。以阿联酋为例,“阿布扎比全球政策对话”围绕发展权、数字主权和气候治理等议题重塑合作框架,形成了相对独立于中印主导路径的南南合作框架。^① 沙特倡议设立“南方协调秘书处”,推动西亚、北非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跨区域协调,试图打破南南合作中的结构性不平衡,推动阿拉伯国家从规则接受者转向规则倡议者。^② 这些举措稀释了部分新兴大国的主导地位,提升了阿拉伯国家在议题设定中的规范能力。^③

① Emad Al-Ketbi, “Abu Dhabi’s Strategic Dialogue Diplomacy: A Southern Perspective,” *Gulf Policy Journal*, Vol. 10, No. 2, 2022, pp. 35 ~ 48.

② Timbuktu Institute, “Saudi Arabia-Africa Summit: Towards the Revitalization of a South-South Axis?” November 15, 2023, <https://timbuktu-institute.org/index.php/toutes-l-actualites/item/773-saudi-arabia-africa-summit-towards-the-revitalization-of-a-south-south-axis>.

③ Noura Erakat, “Reimagining South-South Solidarity: Norm Contestation and the Arab States,”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40, No. 9, 2019, pp. 1631 ~ 1647.

然而,制度差异与能力不均仍制约制度整合,对新兴大国的路径依赖亦难以在短期内改变。因此,阿拉伯国家的制度转型不仅依赖内部协调,还需要南方集体的合法性支持。^① 总体而言,海湾国家通过机制设计与议题主导,逐步确立其作为“中介型国家”的战略定位。这一制度跃迁不仅增强了阿拉伯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代表性,也有助于推动全球南方话语结构的公平性与多样性。然而,阿拉伯国家在这一转型中的制度塑造稳固性,关键在于将跨区域共识固化为制度安排。^②

(二)“去工具化”的话语策略与发展权的规范重塑

南南合作原本旨在打破南北结构性不平等,但随着新兴大国在资本、基础设施与市场准入层面的主导,其内部失衡逐渐加剧。部分阿拉伯国家提出“去工具化”策略,试图将南南合作从资源交换和战略延伸转向以发展为核心的规范性合作。这一“去工具化”的话语策略既是对南南合作异化趋势的批判,也反映了阿拉伯国家对制度对等与规范共建的诉求。^③

通过去除工具性框架,阿拉伯国家强调合作应基于能力平衡、制度共治与议程协商,重新定义南南合作的目标与方向,使其回归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自主协商与制度共建模式。在这方面,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的研究报告指出,阿拉伯地区在三边合作框架内逐步形成以制度平衡、伙伴协同和能力建设为导向的新型合作结构,其中包括摩洛哥等国在财政透明、发展平权和协同治理方面的倡议。^④ 这一转向强化了南南合作的制度自主性与集体话语权,使合作从项目驱动回归规则驱动。

依托此策略,阿拉伯国家不仅在合作机制中实现制度介入和规范塑造,也试

① Amitav Acharya, *Constructing Global Order: Agency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155 ~ 208.

②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Secretariat,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Vision for Regional Security,” 2024, <https://www.gcc-sg.org/ar/MediaCenter/DigitalLibrary/Documents/GCCPOL%20EE.pdf>, pp. 8 ~ 15.

③ Fouad Chabih, “Coopération Sud-Sud et Justice Structurelle: Les Défis de L'égalité dans le Monde Arabe,” *Revue Maghrébine des études Politiques*, Vol. 17, No. 2, 2020, pp. 45 ~ 62.

④ 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South-South Cooperation, “Triangular Cooperation with the Arab Region: Policies, Perspectives and Practices of 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 (DAC) Members,” 2023, <https://southsouth-galaxy.org/wp-content/uploads/2023/10/UNOSSC-Triangular-Cooperation-with-the-Arab-Region-WEB.pdf>, pp. 22 ~ 24.

图打破全球治理中“强主导—弱配合”的结构性失衡,其目标是以发展主权为核心,建构基于规则对等的合作秩序,为全球南方争取制度对称、发展正义与合作尊严提供新路径。

(三) 全球治理结构改革中的制度性塑形路径

阿拉伯国家正从制度回应者转向治理塑造者,这在联合国改革和全球金融治理议题上尤为明显。长期以来,阿拉伯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中代表性不足。对此,阿拉伯国家逐步将全球南方政治认同转化为制度改革的合法性资源,提出代表性再构和权力再分配的诉求。例如,阿尔及利亚、埃及和卡塔尔等国联合提出在联合国探索“全球南方轮值代表机制”,以提高南方国家话语权。此提案标志着阿拉伯国家首次将全球南方权利系统性嵌入联合国改革议程。

在国际金融机制中,阿拉伯国家倡导发展中国家实质性参与,推进配额改革、发展权与债务减免挂钩等议题,推动金融治理规则重构。同时,借助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等媒体平台,阿拉伯国家强化南南合作中的南方主体意识与公共话语,为制度改革营造舆论支持。在具体制度改革路径上,阿拉伯国家采纳“制度性不结盟”策略,拒绝在大国间选边站,同时推动形成去中心化、多极化的全球治理结构。^① 此举旨在实现从抗议型回应向建设型参与的跃迁,并力争确立其作为“南方规则共同体”成员的制度性身份。

总体而言,阿拉伯国家正从资源供应者向治理创新者加速转型。通过积极参与多边机制、提出“去工具化”话语并推动制度改革,它们不断增强制度塑造能力与话语权。这一转型不仅推动了全球南方话语结构的再平衡与多极化,也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制度对称与发展正义开辟了新路径。尽管仍面临区域内部差异与外部大国干预等挑战,阿拉伯国家已展现出从边缘化走向制度塑造核心的趋势,在联合国改革、金融治理改革以及南方规范倡导等领域的尝试,表明其不再局限于被动回应,而是通过制度建构与话语主导,为全球治理的重构注入新的思路与动力。

^① Faisal Mohammed Al-Thani, “Institutional Non-Alignment and the Arab South: Strategic Autonomy in a Multipolar World,” *Doha Policy Review*, Vol. 15, No. 2, 2021, pp. 45 ~ 63.

五、结 论

阿拉伯国家在全球南方话语中的战略转型,正从资源供给向治理创新转变,体现出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不断增强的制度塑造能力与话语能动性。通过积极介入多边机制,阿拉伯国家致力于摆脱单一受援者身份,向规则倡导者与制度构建者转变,特别是在气候治理、发展融资与国际金融机制改革等关键领域,通过运用全球南方话语成功塑造并推动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议题。尽管转型具有阶段性,但其制度嵌入趋势日益稳健。

在全球南方框架内,阿拉伯国家的角色转型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海湾国家依托资本与能源优势,逐步确立“中介型国家”的身份,强化在制度议题与平台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北非国家注重文化自主与制度创新,借助区域一体化与南南合作机制展现独立性;黎凡特国家则以安全与主权议题为核心,维系人道主义的南方身份,巴勒斯坦问题为该地区赋予了特殊的道义高度,约旦在区域稳定与难民治理中突显出人道主义南方的象征意义。这种多路径并存的格局一方面拓展了阿拉伯国家在全球南方体系中的能动性空间,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区域内部的地缘分化与制度协调成本。

在话语策略上,阿拉伯国家提出“去工具化”的南南合作理念,意在突破资本导向和资源交换的传统模式,转向以发展权、制度平权与合作共治为核心的新路径。摩洛哥等国倡导以财政透明和发展平权为导向的合作伦理,反映出其在重塑合作规范性方面的主动尝试。然而,这一理念的实践仍受到发展阶段与产业结构差异等规定制约,制度共治的推进有限。

在全球治理结构改革中,阿拉伯国家不再局限于争取象征性的代表席位,而是尝试通过“全球南方轮值代表机制”、金融治理配额改革与债务减免挂钩等议题,将南方政治认同转化为制度改革资源,推动全球治理朝去中心化与多极化的方向演进。但改革议程仍受制于既有权力结构与制度惯性,其可持续性与制度化程度仍有待观察。

在更广泛的全球公共议题中(如气候治理、公共卫生、数字经济等),阿拉伯国家通过制度性参与和话语塑造,有望为南方国家争取更平等的表达空间与议题设置权。但实践层面仍存在制约:内部方面,财政波动、产业结构单一、官僚效率差异及政策连续性不足,削弱了倡议执行力与制度建设的稳健性;外部方面,国际制裁、金融规则与知识治理体系的高门槛,使文本进入与规则采纳和资金兑现之间仍存在落差;机制层面,从议题设定到规则细化再到执行评估的链条尚未完全闭合,部分机制仍停留在倡议阶段。这些现实限制表明,阿拉伯国家的制度塑形能力虽在增强,但仍未形成持续的全球影响力。

阿拉伯国家的全球南方战略转型在话语与规则层面推动了权力结构的再平衡,但这种制度能动性具有明显的条件性与阶段性。只有在区域局势稳定、合规成本可控、跨区域标准逐步对接的前提下,其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影响力才可能提升。未来的转型成效取决于三个关键维度:一是资金工具的到位与资本撬动效应;二是规则接口的细化与衔接水平,包括数据共享、争端解决与税务协调机制的完善;三是能力建设的可持续性,尤其在本地化培训、制度共建与法规制定中的制度化成果。若这些领域能取得实质进展,并进一步缓解内部地缘分化、提升区域协同效率,阿拉伯国家有望在全球南方规则共同体中确立更为稳固的核心地位;反之,其影响力或仍将停留在议题倡导与阶段性制度参与层面。

总体而言,阿拉伯国家的全球南方战略转型既是对反殖民历史记忆的制度化延续,也是对不平衡全球治理秩序的现实回应。其未来意义在于,若能实现从参与者到塑造者的真正跃迁,全球南方话语将从政治象征迈向制度实践,推动国际秩序的多极化与规范平衡;反之,若转型止步于议程倡导,其结构性影响将被削弱。本研究揭示了全球南方国家制度能动性与话语政治之间的互动逻辑,为理解中等国家如何通过制度创新介入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阿拉伯国家在跨区域合作(如七十七国集团与非盟—阿盟机制)中如何实现制度共建与规范协同,以判断全球南方能否真正走向一种以平等、共治与可持续为特征的新型治理范式。

30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and Global Governance Reform: Upholding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Breaking New Ground

Abstract: Driven by a diverse range of actors, the process of global governance has achieved a number of developmental accomplishments; 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in certain issue areas has become more equitable;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and the United Nations have emerged as the central pillars of global governance; and diverse governance approaches have been developed, helping to alleviate some global challenges. However, as the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grows increasingly complex, the inherent flaws of global governance have become more pronounced, and previous achievements have shown signs of regression. Western-centrism and assimilative governance concepts persist, and global governance continues to lack substantive democracy; the process of achieving equitable power distribution has stagnated or even reversed; institutional fragmentation has intensified, weakening the status of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and global governance faces a trend toward hollowing-out. Based on a dialectical understanding of both the past achievements and the enduring and emerging problems of global governance, China has proposed the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On the one hand, this initiative seeks to uphold and revitalize the fine traditions of global governance in terms of power distribution,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and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countering the recent “backsliding” behaviors of certain major powers. On the other hand, the initiative strives to replace Western-centrism and assimilative governance concepts with people-centered governance objectives and deeply democratic organizational principles, while seeking to strengthen the systematic integration of governance practices. Grounded in China’s extensive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global governance reform, the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will promote reform in global governance in a way that both uphold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break new grounds.

Keywords: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global governance, Chinese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reform

Author: Yu Bowen,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Fudan University.

Yu Bowen

Global South

53 The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of Arab States within the Global South Discourse

Abstract: Arab states are undergoing a strategic and discursive transformatio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Global South, shifting from a reliance on historical memory towar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This process continues the anti-colonial and de-depend-

ency traditions while being reshaped by geopolitical dynamics, resource endowments, and regional diversity—resulting in three distinct trajectories: the Gulf “resource-based South”, North Africa “cultural South,” and the Levant “security-oriented South”. Such differentiation reveals the inner tension of a “North within the South”, reflecting the multiplicity of Arab states’ identity positions and cooperative approaches. Relying on energy, capital, and infrastructure collaboration, Arab countries have deepened South-South relations and integrated themselves into global governance through multi-lateral and regional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demonstrating an emerging capacity for normative and institutional shaping. Nevertheless, this transformation remains constrained by internal structural fragmentation and external intervention. Overall, the interaction among identity construction, strategic practice,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underscores both the shared aspirations of the Global South to reshape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complex realities and constraints confronting Arab states in their pursuit of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discursive agency.

Keywords: Arab States, Global South, identity construction,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uthors: Ding Long, Professor, Middle East Studies Institut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Ma Xiaomei, Lecture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orthwest Minzu University.

Ding Long and Ma Xiaomei

Area Studies

78 The Political Shift of the Alternative for Germany: The Evolution of Populist Crisis Narratives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Alternative for Germany (AfD), with a focus on the logic of populist crisis narratives and their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As the most influential far-right party in Germany, the AfD has risen to prominence by repeatedly employing “crisis-framing” discourse during the Eurozone debt crisis, the refugee crisis, and the energy crisis. Through anti-establishment narratives, it mobilized public discontent and reconstructed political legitimacy. Yet this strategy has also produced an internal dilemma: the deeper the AfD becomes embedded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and gains parliamentary seats, the harder it is to sustain its anti-establishment identity, thereby weakening its populist mobilization capacity. Ideologically, the party has shifted from economic liberalism to national conservatism, but recurring internal divisions have exposed its weak organizational cohesion and the fragility of its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By analyzing the AfD’s discursive strategies and organizational evolution,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its trajectory not only reflects the struc-